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 发展与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史学集刊

本辑执行主编 邹振环 黄敬斌



第四辑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 发展与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执行主编:邹振环、黄敬斌.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

(复旦史学集刊·第四辑)

ISBN 978-7-309-08503-7

I. 明… II. ①邹…②黄… III. 城市史-华东地区-文集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1092 号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交流

执行主编 邹振环 黄敬斌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75 字数 426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03-7/K·357

定价: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主题论文

一、城市·经济贸易

- 试析南宋以来江南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原因 [美] 王国斌 / 3
- 江南市镇：乡村的城市化 樊树志 / 13
- 清末上海与山东的大豆帆船贸易 [日] 松浦章 / 21
- 浙江城市经济近代演变述论 陈国灿 / 39

二、城市·文化交流

- 明代宁波的城市与文化交流 钱茂伟 / 55
- 近代上海城市管理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 马长林 / 67
- 近代上海的石库门与江南民居文化 邹振环 / 83
- 从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圈”看江南市镇
——以江苏省吴江县为例 [日] 佐藤仁史 / 102

三、城市·图书文献

- 《遵生八笺》的养生理论与实践
——晚明江南文人市隐生活指南 陈 江 / 125
- 近代江南城市的方志图书市场 巴兆祥 / 135
- 黄人译述小说《哑旅行》的发现及其价值与影响 龚 敏 / 149

四、城市·社会人口

- 政治与实践：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江南城市的丧葬活动
..... [美] 梅尔清 / 161
- 明清政府对乍浦镇的管理 张海英 / 177
- 魏塘：明代以降一个江南城镇的空间形态与社会变革 冯贤亮 / 192
- 明清大松江地区棉业市镇格局与人口分布：一个 HGIS 的
观察 苏基朗、谭家齐 / 207
- 明代江南城镇人口规模再探 黄敬斌 / 224

论点精选

“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

- 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 李伯重 / 249
- 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 范金民 / 255
- 从抗议到陈情：新型群众集体行动的兴起与清朝官府的对应
..... 巫仁恕 / 259
- 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
——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 王振忠 / 264
- 论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朱荫贵 / 267
- 晚清江南城市的新式教育 戴鞍钢 / 272
- 康熙帝和徽商的遭遇
——以歙县岑山渡程氏为中心 [韩] 曹永宪 / 275

圆桌讨论

- 江南无“宗族” [日] 滨岛敦俊 范金民 吴建华等 / 281
- 关于台湾城市史研究的两个社群 巫仁恕 / 293
- 江南视野下的杭州近代城市史研究 丁贤勇 / 298
- 新资料、新视域：如何拓展城区史研究 马学强 / 311

演讲荟萃

“邂逅西洋”与近代日本的自我认识

- 以农业为视角 [日] 胜部真人 / 317
- 平安时代初期的新罗商人、唐商人
——基于日本古代史研究动向和前近代的中日韩关系略史
..... [日] 西别府元日 / 325
- 关于二战前日本在旧中国内地建造的神社
..... [日] 中岛三千男 / 332
- 关于学习历史学的意义

——对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学们的演讲	〔日〕小林一美 / 340
● 翻译与近代中国的形成	黄克武 / 348
● 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吕妙芬 / 352
● 明治维新与公论	
——比较历史的理解	〔日〕三谷博 / 355
● 新文化史与晚明印刷：公共舆论的产生与文权的转移	
.....	〔美〕周启荣 / 362
● 宗教、商业与法律：上海城隍庙与清代地方公共社会	
.....	〔美〕周启荣 / 367

学术动态

●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的发展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林 盼 / 373
● 2009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学术会议纪要	/ 384
● 2010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学术会议纪要	/ 392
● 《徐光启全集》评介	张钰翰 / 395
●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目录(2009 年秋—2011 年春)	
.....	/ 400

编 后	/ 403
-----------	-------

明清以来江南城市发展 with 文化交流

>>>



主题论文

一、城市·经济贸易

试析南宋以来江南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原因*

〔美〕王国斌(R. Bin Wong)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如果我们对过去的一千年间中国与欧洲经济层面上的变化过程细加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差别,即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长期以来固定在江南地区,而欧洲随着经济领域的革新与扩张,其经济中心的位置却一直漂移不定。过去的几个世纪,欧洲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及地中海流域国家向低地国家的转移,随后又在历经英国之后,于19世纪末期进入了德国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的欧洲经济中心的变迁,与这些国家在生产与贸易领域的经济行为与组织管理上的显著变化密不可分。因而,人们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将经济区域上的变化与经济领域的变革联系起来,随之而来产生某种联想,即经济上的发展必然与经济最发达区域的变迁密切相关。历史上,无论多么强势的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过崛起与衰败的过程,上述所言的经济中心之变迁,只不过是这一人们普遍认同的共识,又做了一个注脚而已。

在当今世界,经济上的财富(economic wealth)与政治上的强势(political power)之间,有着清晰而强有力的关联。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之中,英美等政治超级大国同样在经济领域领先世界。如果对过去一千年经济领域此起彼伏的普遍经验加以审视,同时将当前历史时期的特定视角作为参照,可以发现,政治与经济上的成功总是紧密相连。因而,我们开始对中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失去其领跑全球经济之地位的原因进行思考。我们发现,如今的中国一

* 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林盼翻译,并经王国斌教授审订。——编者注

如既往地在全球领域快速增长之时,江南依旧占据了中国经济中心的位置,似乎此前所得出的经济中心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迁移的经验,对中国的例子并不适用。本文拟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层面发展历程上的差异进行梳理,力求对江南在过去长期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现象进行解析。同时,这种对中欧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探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事实,即中国今日的崛起,并不符合我们在之前的历史时期所观察到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地位迁变的模式^①。

欧洲经济核心区域的迁变

自13世纪开始,意大利城邦经济迅速发展,进而成长为欧洲经济的中心。这种发展的动力,源于其在丝绸、香料与谷物的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积极参与。在1340年代的黑死病之后,欧洲经济快速的复兴与扩张,使得意大利的城邦在14世纪日益显现出超出其他地区的繁荣与强势。海运贸易的日渐扩展,伴随而来的还有海盗势力的增长,航行在海上的商人成为海盗攻击的对象。为了保护那些与亚洲的丝绸与香料交易中所得到的来之不易的巨额收入,商人将他们的商船武装起来,以避免海上掠夺。19世纪之前欧洲远距离贸易的主要特征是对那些来源于遥远的异域国度稀有商品的利益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对于香料的争夺并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往往会上升到政治与军事领域。在获得这些商品之后,欧洲人对远距离贸易所带来的高额回报倍感欣喜。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因其在远距离贸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占据了经济中心的位置。由此所获得的大量财富,也有力地支持了城邦的文化创意与政治野心。然而这种远距离贸易,并不符合经济学对现代商业的基本定义。根据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著名理论,推动经济发展的贸易模式,必须是产生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及对比较优势的追求(*the pursui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而意大利城邦的贸易活动,其主导权仅由若干寡头巨商掌控,贸易活动也只是在有限的几个领域扩展,谈不上互惠互利,其形式也远非变化多样,这与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模型构建并不吻合。政治与军事上的强势,保证了意大利城邦经济的成功,进而鼓励了意大

^① 我在创作本文之时,并未参考相关书籍,因此文章自始至终没有作注。我只是想提出某些论点,以待未来加以发展充实。

利商人在奢侈品贸易领域的生意开展。16世纪末,葡萄牙人获取了原先属于意大利人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统治时代极为短暂,很快就面临了荷兰人的竞争。

荷兰人在海运贸易上的发展模式,与此前的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并不相同。首先,海运贸易只是日益发展的欧洲西北部地区毛织品及其他商品贸易行为的一种补充;其次,在商品性农业生产及一些手工业活动的推动下,荷兰国内经济日渐繁荣;其三,荷兰海运贸易的管理能力,使得贸易收益更为经济高效。在国内经济迅猛发展,及与欧洲内部和亚洲的外贸回报的双重鼓舞下,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欧洲商业与金融中心。此外,在证券交易所与银行等新兴金融市场的推动下,阿姆斯特丹建立了欧洲地区最大的商业法庭,商人可以带着那些争议不休的合同来此寻求审议与判决。经济增长对文化繁荣是一种推动,尤其对于那些画家与科学家而言更是福祉。这种财富上的累积,让荷兰人有能力叛出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他们利用当时欧洲通行的王室政治联姻方式发展势力,不久之后即拥有了属于荷兰人自己的领地。这场始于1568年的反叛行动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随之而来绵延不绝的独立运动,使得荷兰共和国终于在1648年成立,结束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反叛行动亦波及南荷兰省,即之后的比利时王国,以及卢森堡、法国北部等地区。

到了18世纪,由于英国经济与政治势力的崛起,荷兰在欧洲国家内的经济霸权地位宣告终结。英格兰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广义上与荷兰的成功经验较为相似,即国内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其他欧洲国家经济活动的开展,以及海上贸易的扩张。政治上的强势与经济上的发展,这两个推动荷兰崛起的原因,也同样适用于英国。对荷兰与英国霸权地位的历史描述,其细节往往有相似之处,其中不可避免的是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capitalism)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national states)这两大因素。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奠定当今世界基础的两大核心要素。毫无疑问,对于其中任何一种要素的解析,文献材料都是数量庞大、不胜枚举。然而,虽然在不少历史问题上,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仍存在着一些争议:首先,大多数学者都发现,当代经济的发展模式源于欧洲历史,随后才散布全世界。其次,学者们虽然认为现代国家政权建立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但历史的记载已经遭到了欧洲国家的篡改,使得他们无法认识到产生这些判断的起因。无论这些争议只是一种假设,抑或是已找到确凿的证据加以断言,都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两种当前历史进程主流描述的权威性的某种削减,而且这两种描述也无法解释过去两个世纪所发

生的许多事例。回顾从14世纪到18世纪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与此同时,江南则一直占据着中华帝国经济的核心地位——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代欧洲早期政治与经济的变化特性,并认识到欧洲之于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独特性。

近代欧洲早期经济中心地区发生转移之时,政治势力也随之产生迁变。这种经济与政治领域所产生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了重商主义的诞生,并由此推动了欧洲人建立起新的机构,来对他们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进行审定。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公约是第一份关于国家主权的协议,其中对欧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原则进行了规定。为了相互之间的竞争能够顺利进行,统治者不得不建立起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与军事力量。统治者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比以往更广,而且新的发展管理模式也要求精英人士参与其中。新的商业法庭、股票证券交易所、银行,以及企业制度的出现,都得益于这些经济领域的竞争。在欧洲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主要依据斯密对商业发展的论述,但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欧洲人的贸易活动,与政治势力的渗透紧密相关。欧洲的政治势力在美洲、亚洲以及稍后的非洲,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却并未使用在欧洲范围内广为盛行的外交准则。欧洲各国之间奉行经济外交,但当欧洲与其他大洲交往的时候,政治因素却是首当其冲,经济与政治所扮演的角色,二者截然不同。

如我们今日所认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建立是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定现象。推动这些现象产生的动因,不仅能够解释欧洲内部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样也能解释欧洲人漂洋过海追求财富与权势的方式及原因。欧洲国家与资本主义向其他地区的扩张,使得学者们在对世界历史进行解释时,往往会援引欧洲国家的发展模式,即政治与经济方式互相倚重,双管齐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重大差异:这种政治与经济并重的发展模式,适用于欧洲内部、及由欧洲主导的欧洲与其他大洲的政治与经济交往。然而,以欧洲为主的历史发展模式,与其他大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将欧洲与中国进行对比,可以将上述由经验主观所得的认识变得清晰起来,我们也可以从江南在多个世纪中稳定地占据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事例中,得到一些解释。

作为农业帝国的中国经济发展之动力

若我们回溯两千年前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并峙东西之时,我们会发现上述

两大政治实体在领土与人口等方面的情况极为类似。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占据了几乎同等大小的土地,前者是230万平方英里,后者则是220万平方英里。汉帝国的人口最高达到5960万,罗马帝国的人口也在6000万左右,它们的总和超过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两大政治实体也都因为国内的矛盾与来自草原上的军事劲敌的挑战而崩溃。但当欧洲进入到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之时,经济发展特征转变为单纯的生存型经济(subsistence economies)与小城邦型经济,而中国仍保持着帝国的形态。两者后续发展的不同路径并非政治领袖的理想野心不同的结果。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而兴的统治者,都希望能够恢复两大帝国的盛世,控制先前的帝王所统辖的人口与土地。但中华帝国在其第一个千年之中所构建的政治理念与官员选拔制度,让帝国获得休养生息(recreation)的空间,其内部的凝聚力(consolidation)也得以发展。农业帝国的发展理念一直得到贯彻,从13世纪蒙元帝国的重新统一到20世纪初清帝国的覆灭,这一理念长期盛行,从未消歇。而在这七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的政治领袖同样力图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历程,来削减独立的小政治实体的数量,这一历程奠定了当前国家组织架构的基本特征。然而,欧洲却很少出现面积很大的国家(当然这里所称的较大的空间面积,仍然远远小于中华帝国),查理大帝在中国唐朝时期所聚合起来的庞大帝国,仅仅存在了一代人的时间,而拿破仑与希特勒也只能使用逾越常规的方式,凭着各自的野心与抱负,在短时间内将威权传布到几个欧洲国家而已。从中国人的政治视角来看,在罗马帝国倾覆之后,19世纪之前的欧洲人一直生活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度之中,大部分城邦所管辖的人口数量极为有限。

在中华帝国庞大疆域的每个角落,和平景象处处可见,这对经济领域的发展无疑堪称福音。若森萨(Jean-Laurent Rosenthal)和我在《分流之前与超越分流: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变革的政治背景解释》(*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一书中,多次申明了这一观点。在远离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商人积极投身贸易活动。根据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原则的理论,社会稳定将会使得人们自我管理,开拓贸易。在11世纪至18世纪之间,商人在农业与手工业领域的大量投资,让商业管理与物流运输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而在此七个世纪间,当欧洲的经济中心从地中海流域向西北部转移时,江南则成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殊荣。

江南成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缘由尤多。其初始的动因来源于政治与经济两大要素。政治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从北方到江南的大规模移民

行动,许多人因战争而远离故土。移民来到一地,即开垦新的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江南地区的农业资源条件与北部中国完全不同,因此移民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北方民众的旱作种植方式,而是大力种植水稻作物,开渠挖沟、构建水网。江南的气候也十分适于生产蚕丝与棉花,手工业亦因此得益。自宋迄清,在遍及整个帝国的市场交易原则的推动下,商业同样开始腾飞。斯密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在帝国的各个区域体现了出来。在宋代,江南开始成为全国的纺织业中心,由此出现了几个世纪的人口高速增长,而该地的棉纺织品也行销全国各个区域。江南质优的纺织品逐渐开拓市场,其价格之低廉亦让本地百姓得到实惠。这种基于纯商业发展而出现的市场原则,中国显然比欧洲更完善,后者在商业竞争之中,又加入了一些政治性因素,这从欧洲出口商品所赚取的利润远高于进口一例可见端倪。这种政治竞争模式所推动的海运贸易,反过来又成为欧洲经济中心区域转移的重要因素。

如果仅仅涉及经济原则本身,那么经济中心的空间区域转变更有可能发生在某个资源条件较为特殊(以及资源条件较好)且已开始采掘的地区,这种转变的动力,往往来源于技术能力的发展,资源由此可以充分利用。也可这么说,经济新中心的崛起,归功于资源条件较为特殊(以及资源条件较好)或是商业管理模式等因素的襄助,这些因素可以让现有的资源产生更高效的生产力。但科学技术能力与商业管理模式,亦有可能在某些资源条件较为一般的地区发挥效力。因此从长时段来看,影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只能归结为某些先天因素(例如资源、劳动力素质、资本绩效等)。

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及手工业知识的普及,鼓励将这些有效的实践经验进行转让。商业管理模式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虽有稍许改变,但由于全国的商业网络在空间上往往会出现重叠,因此不同类型的商业管理模式至少在部分商人群体中得以推广。事实上,如果切实存在着某种历史现象,即各地的商业管理实践存在显著差别,而这种实践只在本地区产生效果,并不为外界所知,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在此前的岁月中,不同地区的经济活动表现同样出现过兴衰转变。这些变化究竟源于何时,往往难以考证。因而,通过验证与分析可以表明,当江南确立其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单纯从经济领域,很难有别的地区有能力对其进行挑战。

对欧洲经济中心区域的多次转移及自宋代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区域长期固定在江南的解释,看来不能仅限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上的不同状况,造成了中欧两地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与巩固,使得明代至清前期的官府能够在最大限度将资源与技术知识从

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由于这种经济发展几乎不依赖商业税收,因此中国官员通常在稳定和平的环境下允许发展商业,避免产生各种类型的政府干预,而在欧洲,政府的主动干涉几乎是家常便饭。欧洲的商人经常会面临远高于中国同行的商业税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获得政治特权市场准入的资格,尤其是当商人远渡重洋赚取重利之后更要如此。当欧洲的统治者希望发展商业以获取高额利益之时,他们一般会鼓励将商业资源进行流通,但所征收的税收会让商人的利润受损,对他们投身商业的兴趣也是一种伤害。因而,对于那些有着明确海上贸易目的的国家而言,海外贸易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以为商人牟取高昂私利,也可让政府收入得到增加。

资本主义与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学要素之间的差异,可以让我们很快得出下列的解释,即为何在11世纪至18世纪之间欧洲的经济中心多次发生转移,而这一状况却并未发生在中国。如果我们以欧洲经济中心多次迁变的事例作为评价基准的话,江南能够在几个世纪之中占据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就不能视为一件寻常之事。如果能认识到两大区域之间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不同路径,我们就应该理解到两地政治经济学上的差异,以及所导致的长时段内欧洲经济中心多次转移与中国的经济中心固定在江南地区的现象。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工业革命之间的漫长岁月之中,对中欧两大区域的经济与政治空间上的差异的分析显得十分必要,它们两地之间的往来似乎并没有干预到各自经济上的发展,也没有影响中国经济中心的相对稳定与欧洲经济中心多次迁变的现象。在19世纪之后,中国的国门开始向西方“敞开”,中欧之间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联系开始加强。世界各个区域在过去若干世纪中的交流状况,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工业革命究竟对中欧两地的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亦能加深对外欧两地经济中心迁变方式的理解。

从两大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比审视全球经济

欧洲的经济史学家都很乐于将工业革命的历史意义进行定位,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包含了18世纪末期之前的几个世纪内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技术条件上的改变,促进了工厂生产方式的形成。然而事实上,这些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变革因素之中,有相当数量同样出现在中国。斯密关于商业发展动力的理论,对欧洲经济自然有指导意义,但至少在中国也一样适用。中国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洗礼,这被认为是中欧之间出现经济发展不同路径的根本因素,但除非我们能够认定,

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对于科技创新——诸如新式棉纺织业生产及之后的铁、钢、铁路等产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才行。我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中曾经指出，欧洲的科学技术革新所取得的成就，不能直接归功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推行。欧洲人自然没有专门为工业革命制订计划，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正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变革时代之中，在棉纺织业生产革新开启之后，数十年间无数重大变革逐次展开，逐渐完成了工业革命。若森萨和我在《分流之前与超越分流：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变革的政治后景解释》(*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一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与中国极为相似，而欧洲的手工业生产在城市经济布局中所占的份额，甚至在中国之上。回溯到16、17世纪，当时的技术能力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农村手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原因是农村地区廉价的食物与较低的死亡率，造成劳动力成本也随之降低，用于纺织业生产的资本商品主要由农村家庭控制，城市工场或工厂并无太多所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这种政治性竞争的一个计划外的成果。简单来说，欧洲内部的战争威胁，使得各企业主不得不全力保护他们在城市中的资本，尽管农村生产成本十分低廉，但他们早已是无力他顾。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即是劳动力资本大量集中于城市的趋势，这种变化对于技术能力的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

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工业革命的出现无疑提供了众多机遇。这场革命大大推动了基于劳动力分工与比较优势等因素所产生的贸易关系。但在19世纪下半叶，贸易发展的另外两大要素被提了出来，作为与斯密关于商业自由发展理论进行区分的关键。首先，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仍旧依赖于向殖民地与前殖民地百姓的生产及贸易往来所征收的高额税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原材料与农作物，由此可以更好地平衡当下的市场环境。例如美国南部的奴隶为英国的工厂生产大量棉花，而他们所获得报酬非常有限；而在1830年后，荷兰的农业制度迫使农民只能为设在如今印度尼西亚所在地区的当局生产某些强制规定的作物，这两个例子都表明，在市场网络之外，存在着依靠某种政治威权(coercion)而进行的生产与交易活动。其次，在19世纪商品贸易增长的同时，思想理念、人口数量、资源开发等方面，亦在进行飞跃式发展。技术能力的转移尤其在欧洲之外的工业中心发展过程中产生效力，以日本为最佳例证。这种在经济领域向外传布的过程，最典型的是工业技术传入欧洲以外的国家，成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必经之路。简而言之，19世纪世界贸易

的发展,均有赖于工业革命之力。如前例可知,殖民地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承担着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所限定的政治与经济使命,负责提供原材料;如后例可见,日本成功受益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机遇,摆脱了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地命运。

中国的情况则显得相对复杂。这个与欧洲面积同等大小的国家,并没有像面积较小的国家如日本与英国那样,在19世纪出现明显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学家往往将大不列颠岛划分为一个个有限的经济单位进行观察,因此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显得十分清晰。若将观察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英国的原初工业化显然只是一种较为保守中庸的模式。欧洲工业化进程在历经了三次浪潮之后,在20世纪初将现代化的生产模式传布到欧洲各地。率先发展起来的是英国,随后在海峡对岸,法国、德国也随之而起。西欧的其他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起步,中欧、东欧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则要迟至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肇始于19世纪末期。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制度条件与欧洲截然不同,但中国仍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工业化变革浪潮。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政府如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般,将工业化视为最基本的经济发展要素,以此累积财富、增强国力。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及1950年代的共产党政府,都将重工业的发展看做是建设强国的根本出发点,以增强军事实力,抵御外侮。1949年之前,工业发展的主要命脉由中外私人业主控制,轻工业成为工业领域的主干力量。最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均云集上海。而在1949年后,工业化第二股浪潮中的核心力量——私人市场经济被逐出新中国的经济蓝图,代之而起的是将城乡经济二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城市成为工业基地,农村则只需要完成农业项目,不再承担工业任务,这是在过去数十年及若干世纪中从未出现过的景象。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极其依赖市场交易网络的经济中心不复存在。上海及江南地区仍然是国家经济的核心区域,但这一地区已经不再如过去的数十、数百年那样,成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

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开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在这股第三波工业化浪潮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方略,其主要内容为打开国门,促进中外贸易。而对多样化的私人民企的政策支持,也让那些由市场掌控的生产与交易活动开展。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最初被看做是计划经济的一种补充,因此只是存在于一些乡镇企业之中,但非国有制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渐渐破坏了此前几十年内计划经济部门设定经济目标的权威性与可取性,这种现象在苏联与中国都有体现。事实上,政府部门在